

# 绪 论

## 一、问题的提出

地理认识,就是人们对一定区域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现象、资源及特征的观察、了解、熟悉与认知过程,它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以及区域开发的知识前提,也是人类“用以产生知识和了解周围世界的方法和途径”<sup>①</sup>,在世界文明演进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世界历史中,每一次地理大发现都会带来对不同国家与地区经济开发与文化交流的高潮,无论是公元前2世纪张骞“凿空”西域、完成对西域、中亚地区的地理发现后开辟著名的丝绸之路,还是15、16世纪西方哥伦布、麦哲伦等地理大发现对世界历史进程所产生的重大影响,都是如此。我国西部幅员辽阔,自然地理复杂,具有生物多样性、地形地貌、植物、气候多样性诸特征,人文历史悠久、民族分布众多,也构成了复杂的人文地理环境。从先民开始,人们是如何对西部复杂的地理现象由神秘到探索并进而逐渐

---

<sup>①</sup> 美国国家研究院地学、环境与资源委员会地球科学与资源局重新发现地理学委员会编,黄润华译:《重新发现地理学:与科学和社会的新联系》第三章《地理学的视角·地理认识论》,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认知的？也就是西部地理的认识史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其认识特点、规律是什么？为什么历史上的西部开发负面因素大于积极因素？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为什么数千年来渐趋脆弱与恶化？为什么唐宋以后西部地区逐渐衰落、与东部地区的经济文化差距日益拉大？历代西部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基于怎样的西部地理认识？这些问题本身就是十分重要的具有学术与现实双重意义的课题。

地理认识属于地理学史范畴，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地理学史，地理学史是后世学者对历史时期地理学发生、发展过程、规律、特点的总结梳理以及对历史阶段地理学成就、地位的评价，而地理认识则属于地理思想史范畴。地理认识相对而言比地理学史要广泛和零散，有时并不要求有地理学思想那样具有严格的逻辑体系，而且作为完整意义的地理认识不仅要研究纯粹自然地理学意义的地理思想，还包括内容更为丰富的人文地理学现象归纳与价值评判。杨吾杨教授在其《地理学思想简史》一书中指出：地理学史实际上由三个部分构成，即地理发现史、地理图籍史和地理思想史。其中地理发现史指的是人类由已知地区向未知地区推进、从而获得新的地理素材知识的过程；而地理学思想史则是指人类对其居住地球表面认识的历史，是地理学说（包括假设和预测）的发展史。是人们关于地理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历史，“是地理学的核心部分”。杨吾杨还认为地理知识是同地理学密不可分、但又有区别的范畴。前者是由于生产生活的需要，对周围环境的认识，而后者则是对认识到的材料予以条理化<sup>①</sup>。前辈学者的理论阐述对我们今天从事区域地理学史的研究无疑具有启发与引导意义。从中国地理学发展史角度看，对西部地区地理现象的关注至少在《禹贡》

<sup>①</sup> 杨吾杨：《地理学思想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

时代就已经开始,《禹贡》、《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早期典籍对西部自然与人文地理状况都有程度不同的记载。此后《史记》中的《河渠书》、《食货列传》、《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对西部地理的记载已经渐趋增多。东晋时期还出现了我国第一部西南大区域方志《华阳国志》;唐代《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宋代《太平寰宇记》、《輿地纪胜》对西部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记载更是十分丰富,并且西部地理学意识也有凸显迹象。宋元以后,西部地理的研究成为中国地理学的主流方向,《徐霞客游记》、《广志绎》、《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輿纪要》、《西域水道记》、《小方壶斋輿地丛钞》等地理书中西部地理占有相当比重。因此西部地理学不仅构成了中国地理学史的一个重要层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正确认识西部地情、历史、社会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二、选题目的与学术意义

历史上对中国西部地理的认识源远流长,为什么选择唐宋时期作为西部地理认识的时间阶段?笔者思维的出发点首先在于唐宋历史社会的特定现象与社会发展表征。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出现重大变革的转折期,不仅是西部中国由盛而衰的转折,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从典章制度、政治格局、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学术文化乃至风俗民情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出现“变革”的气象,日本内藤湖南等学者正是基于这些现象的出现,判断唐宋是中国由中古向近世转变的关键期,进而提出“唐宋社会变革”的著名假说。目前,这一学说在中国学术界已经得到愈来愈多的认同,但是笔者选择这一课题不仅仅只是基于唐宋时期中国西部历史社会的重大变革的文化背景,从地理学史角度而

言,主要还在于考虑到地理学在唐宋时期若干重要变化及成就意义的认识。

### 1. 对大区域历史地理认识史的综合探索

学术研究,贵在问题的深入探讨与创新。我国地理学从古代舆地与政区沿革学发展到今天包括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在内学科门类齐全的现代地理学,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也已经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学术研究成果,但现代历史地理学界对区域地理认识史的研究却十分薄弱,尤其是对西部地理认识史的研究尚是一个学术空白,建国以来我国出版的近十部地理学史著作全部属于通史性研究,不仅断代地理学史著作寥寥无几<sup>①</sup>,区域地理学史著作更是一直阙如。目前还没有一部以《中国西部地理学史》命名的学术著作,唐宋时期的西部地理认识更是至今尚无人问津。中国西部在中华民族文明演进史上曾长期占有重要地位,古代也留下了虽然散乱却十分丰富的西部历史地理资料,对这份遗产加以整理研究,应该是当前中国地理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特点在于其综合性,“因为区域本身意味着综合性与可比性”<sup>②</sup>,对于其研究的难度和意义,邹逸麟先生说得很精辟:“由于区域综合研究,时间跨度长,涉及面广资料难度大,因此成果较少。但也只有区域综合性研究,才会对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中各要素的相互关系和最终影响有深刻的理解”<sup>③</sup>。

① 关于唐宋断代地理学史的著作上世纪以来只有吴其昌先生的《宋代之地理学史》,且篇幅也不大,载清华研究院《国学论丛》民国十六年第1期。

② 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③ 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前言》,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实际上这也是区域地理认识研究同样的价值取向之所在。历史区域地理的认识只有建立在综合考察的基础之上,才能对一个时期人们对区域地理的认识水平、成就、特点有较为全面的把握,因此它与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一般采用的单一专题研究不同,必须涉及到自然、人文、感知三个层面。对于中国西部这样一个幅员广袤地区,综合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同时,由于中国西部是联结东西方文明的通道,唐宋时期,两大文明在此交汇、融合,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我们对唐宋中国西部地理认识的研究也有一定世界史意义。

## 2. 通过研究,可以从一个时代横断面探讨古代西部地理认识途径、成就、特点和规律

与华夏国家中古以后政治社会的重大变迁相同步,唐宋之际也是西部经济文化由盛而衰的转折期,西部最后的辉煌与开始衰落皆发生在这一时期。唐以后西北关中地区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时代的结束、南宋后期成都平原社会经济的急剧凋敝,唐代曾经与东南经济繁荣相抗衡的“扬一益二”的显赫地位也不复存在,并且从此以后与东部地区经济文化的距离日益拉大,都表明唐宋是中国西部历史的重要转折。这在唐宋西部地理之学的盛衰上也得到同步反映。同时,唐宋时期又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与学术文化高度发展的鼎盛时期,对西部地理的认识也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一方面对西部的地理考察活动明显较前大大增多,无论是奉使外交、仕宦游历,还是僧人西行求法,包括接待夷蕃使节,都十分注重观察搜集西部地理风情,有关西部的区域地理、生物地理与地图学著作较为可观,人文地理考察记录更是丰富,西部都邑地理学也在此间形成,留下了虽然散乱却十分丰富的西部历史地理资料;同时唐宋时期有关西部自然地理与文化地理的认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要发现,对这份遗产加以整理研究,应该是当前中国地理学

史需要填补的一项重要任务。

### 3. 关注西部,期冀有用于世

关注现实民生,期待参与社会和有用于世,是史念海等前辈历史地理学家倡导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理念。一部西部的开发史,相伴随的实际上也是一部西部地理认识史。“西部”是一个现代大地域概念,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国家实施的“西部开发”战略工程而逐渐成为热点地名的词汇。由于环境问题、能源问题与经济开发是当代中国所面临的三大主题,而历史地理学恰好与这三方面关系都十分密切而成为当代学林中以“有用于世”而别树一帜的学科。毋庸讳言,《唐宋时期中国西部地理认识研究》这一选题的萌生与目前如火如荼的西部开发时代浪潮激励相关,笔者希望通过挖掘、整理、总结历史时期西部地理认识来为国家与社会贡献一份绵薄之力也不言而喻。西部大开发本来就是一个带有历史意义的宏大综合战略工程,这项伟大战略工程的提出与运作,必须建立在包括历史地理学在内的多学科论证的基础之上。西部地区近一千年来生态环境的总趋势是向破坏性方向前进,而且愈到近代,这一趋势愈出现加速恶化的态势。甚至有许多生物的灭绝,许多自然景观的消失都已经不可逆转而永远成为历史的记忆,这使得今天的我们和我们的后人不得不生活在一个充满种种生态危机的时空环境之中。因此,理性地总结历史上人们的西部地区地理认识,总结历次西部开发中的失误、教训,梳理制约西部前进的病理因素,更好地认识西部历史地理资源,为中央与地方政府决策部门提供历史论证成果与学术咨询,应该是当代历史地理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唐宋时期西部地理认识研究》试图在这一方面作初步探索,力求为总结历史时期西部地情认识与开发活动的经验教训做力所能及的努力。当然并非每一项学术研究成果都能直接

服务现实社会,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也自有其本身的学术任务和价值规律,本书的写作目的主要还在于从中国地理学史角度探讨一个历史时段对西部地理的体认感知,并试图在区域地理认识史方面有所开拓。

### 三、本书中的“西部”地理范围

由于历史上中国西部疆域的盈缩不定与民族政权的存亡更迭以及地理认识与国家疆域观念的不同等原因,要精确划分历史上“西部”的具体疆界并非易事,而且过于精细的追究反而缘木求鱼,不切实际。古代历史地理学中虽然并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类似于现代“大西部”的地理概念,然而这并不能说不存在西部地理之学。事实上,西部地区不仅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客观存在的地理实体,而且古代史籍文献中也存在着出现率较高的“西土”、“西陲”、“西北”、“西南”等地理概念。唐宋时期由于国力强弱悬殊及西部毗邻的中、南亚诸国军事政治的消长变迁,中国西部的疆域范围变化很大,唐朝“西域”在国力最为强盛时的开元年间,安西都护府与北庭都护府所辖已经远及中亚咸海流域,西北疆域要远远大于今天的西北五省。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出兵占领河湟、陇右,切断与西域的交通,西域陷入众多民族势力角逐战乱之中,唐之西北辖区急剧缩小,虽然大中五年(851年)沙州人张义潮率部以瓜、沙、伊、肃、鄯、甘等十一州之地归唐,西北疆土有所恢复,但终不能与开元全盛同日而语;宋朝西北辖区则收缩范围更大,北宋时期,西北大片土地为西夏所控制,宋之“西北”仅仅只是永兴军、秦凤路,而且随着与西夏战事的不断败北,实际所控已非辖区全部。西南地区则也只是四川、广西、鄂西与川渝交界的三峡一带和

湘西沅、辰地区,云贵高原大部为大理国控制,疆域远不及唐。不过唐宋中央王朝控制以外地区的地理考察并没有完全中断,仍有刘元鼎对黄河源、高居海、王延德对高昌、于阗的考察等,因此如果完全按照唐宋王朝的“西部”作为研究的空間范围,自然无法取得一个完整的地理空间界定,也难以进行真正的地理认识研究,所以本书所论述的“西部”采取的是今天我们习惯上已经熟悉的西部地理概念,即大体上以西北五省区(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和西南五省区(四川、西藏、云南、贵州、广西)构成的西部地理空间为主体。

按照目前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发布的“西部概念”,除了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与西南地区的四川、西藏、云南、贵州、重庆四省、直辖市外,还包括我国位置偏西、经济相对落后的省区,这样,就把内蒙古自治区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地也纳入“西部范围”<sup>①</sup>。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涉及的“西部”地理范围基本上是以当代的西北、西南地理范围为主,但把广西纳入西南地

---

<sup>①</sup> 今天中国的“西部”除了西部主体省区外,其边缘省区的范围学术界与公众仍然有争议,参见朱士光:《西北地区历史时期生态环境变迁及其基本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3期。有学者提出了“广义西部”的概念,认为西部除今西北、西南10省区外,“广义西部”的第一个层次,应该把内蒙古和广西全部划入西部;“广义西部”的第二个层次,应该把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的一部分甚至全部都划入西部。同时,也有人提出了划分“近西部”和“远西部”的概念。其中,“远西部”即指上述西部所指10个省市区;“近西部”则指上述10个省市区外,“还应该加上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和西部”。2000年1月,《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纪要》“正式确认了西部开发的范围,按西南、西北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加上内蒙古、广西界定。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新疆、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广西。此外,对湖南湘西州、湖北恩施州,比照西部开发的有关政策酌情予以照顾”。参见马敏:《西部开发的历史审视》第十一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40页。

区。广西盆地在自然地理单元上与西南地区关系密切,自然地貌、社会经济、文化地理与云南、贵州有更多的同一性。在唐宋时期的地理观念中,广西虽然地处岭南,但常常出现在“西南”纪事与诗歌题咏之中。在行政区划设置上,晚唐曾从岭南道将广西析出置岭南西道,宋代则置广南西路,北宋大观年间甚至还将黔南并入广西,设置过黔南路<sup>①</sup>,这都说明广西属于西南地区是有历史依据并且可以成立的。为避免战线太长,本文一般不涉及山西、内蒙地区。但是,由于地理认识中“空间”范围的模糊性特点,人为设置的政区区划并不能完全与经济区、文化区、感觉区重叠,有时“犯规”、“越界”反而是正常的,所以本文中的“西部”范围除了基本上以现代中国“西部”政区疆界为主外,包括广西全部,偶然也涉及中亚、南亚及我国东中部的豫西、晋西、鄂西、湘西等地区。

#### 四、研究历史与现状

我国西部地区幅员辽阔、地形复杂、民族众多,具有气候、生物、地貌及灾害多样性的特点。在中国古代,西北地区的关中平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并曾长期占据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作为地理学的记载实体对象,西部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也一直是古代地理学关注、研究的重点区域,从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从唐代卢求的《成都记》、樊绰的《蛮书》到宋代宋祁的《益部方物略记》、范成大《桂海虞衡》、《吴船

---

<sup>①</sup> 详见《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大观元年，别置黔南路。三年并黔南入广西，以广西黔南为名。四年仍旧为广南西路”，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二七，大观元年“十二月置黔南路”条。

录》、陆游《入蜀记》、从明代章潢的《图书编》、王士性的《广志绎》到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乃至清代徐松《西域水道记》及其《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等,其中西部地区地理内容都是记载重点,清代嘉庆、道光间及 20 世纪初我国舆地学界还曾几度掀起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热潮,这是由西部地理环境本身的复杂性及其中国当时国内、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及格局分布决定的。然而,与西部地区地理本身所蕴含的丰富多样性相比,西部地理认知史、简单地说也就是历史上人们是如何逐步认识西部复杂的地理环境过程研究却显得相当薄弱,这不仅表现在迄至目前还没有一部以《中国西部地理学史》命名的专著问世,就是单篇论文也是寥寥无几,建国以来出版的几部地理学史著作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组编写的《中国地理学史》<sup>①</sup>、王庸著《中国地理学史》(实际上主要是地图学史,其中对宋代《华夷图》、《禹迹图》有较大篇幅的介绍)、王成祖著《中国地理学史》<sup>②</sup>、杨吾杨、鞠继武、赵荣等编著的地理学史著作<sup>③</sup>及其新近出版的唐锡仁、杨文衡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地学卷》<sup>④</sup>等,都对我国古代地理学思想遗产作了开拓性的挖掘、整理和研究,也从全国地理学发展史角度涉及了不少西部地理学内容,其筚路蓝缕之学术价值自不待言,但或许是受到时代学术思潮的局限,这些地理学史著作皆缺少对西部地理认知史

---

①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组:《中国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② 王成祖:《中国地理学史》,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③ 杨吾杨:《地理学思想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9 年 6 月版;鞠继武:《中国地理学发展史》,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赵荣:《地理学思想史纲》,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5 年版。

④ 唐锡仁、杨文衡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地学卷》,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的特别关注,都未曾把西部地理认识史作为一个单独地理视角与认识单元进行研究,因此西部地理认知史从整体上说还是一个等待开掘的处女地。截至目前,能检索到的有关西部地理认识方面的研究论文甚为稀少。顾颉刚、史念海、童书业于20世纪30年代在论著中曾对先秦、秦汉时期中国的疆域观念作过开拓性研究,其中包括西北地理视野所及问题。<sup>①</sup>20世纪40年代德国学者斯泰因有《唐代中国人帕米尔探险记》<sup>②</sup>,则对玄奘、杜环等人在葱岭的地理探险和记载作了简介;在西部地理学史专题研究中,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陈瑞平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古代研究西北自然地理的思想》<sup>③</sup>一文可谓是拓荒之作,这篇论文从现代地理学理论角度总结、归纳了包括唐宋在内的中国古代地理学关于西北区域的总特点、内部差异、类型与变迁、成因和规律及其知识的应用等地理思想,第一次对古代研究西北地区自然地理思想给予关注,并作了初步分析与概括。但文章所及过于简略,属于粗线条掠影之作。以不到6000字的篇幅来研究整个古代丰富的西北地理思想,很难说达到多少深度与广度。尽管如此,其拓荒之功不容置疑;张伟然《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及地理意象》<sup>④</sup>一文将中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空间,探讨唐代华夷文化的空间分布范围及内部差异,其中分析了唐人感觉地理中的西北、西南文化

---

① 史念海、顾颉刚:《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六年出版;童书业:《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童教英整理,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② (德)斯泰因:《唐代中国人帕米尔探险记》,杨弘坚译,《亚洲文化论丛》民国三十三年第4期。

③ 陈瑞平:《中国古代研究西北自然地理的思想》,《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9年第4期。

④ 张伟然:《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及地理现象》,载李孝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

疆界和影响因子,尽管因题目所限对唐人西部地理认识着墨不多,但在理论和方法上不无创新启发意义,诚如李孝聪先生所评价:“他的研究超越了通常纯粹以文化特征的地理空间分布作为划分指标的文化区研究法,代之以古代人们的体认为判断依据的感觉文化区研究方法”<sup>①</sup>。近年日本学者妹尾达彦致力于唐韦述《两京新记》研究,其《韦述的〈两京新记〉与八世纪前叶的长安》<sup>②</sup>一文钩沉索佚,试图通过对《两京新记》佚文的考索,复原唐长安城的原貌,并对《两京新记》于唐长安城研究的意义多有阐述;吕患诚《10至14世纪中国学者对西域的地理认识》<sup>③</sup>则利用宋、金、元时期的几部地理游记记载探讨了宋金元时期人们对西域地区自然地理及人文地理风情的考察与认识情况;另外就是笔者近年来发表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的论文《论唐宋时期对西南地区自然地理的考察及价值》及发表于《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2期的《论唐宋西南史志及其西部地理认识价值》的两篇拙作。前者就唐宋时期学者对西南地区自然地理要素如气候、地貌、生物地理的考察与认识的意义、特点与局限作了分析与评论;后者则重点讨论了唐宋时期一批地理总志及西南地志文献对认识西南地区自然与人文地理方面的价值及意义。此外李智君的《诗性空间:唐代西北边塞诗意象地理研究》<sup>④</sup>,以诗歌形式探讨唐人西域地理意

---

① 李孝聪:《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导言》,李孝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② 妹尾达彦:《韦述的〈两京新记〉与八世纪前叶的长安》,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9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③ 吕患诚:《10至14世纪中国学者对西域的地理认识》,《干旱区地理》1998年第3期。

④ 李智君:《诗性空间:唐代西北边塞诗意象地理研究》,《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象,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从总体上看,以理论自觉研究中国大区域特别是西部地理认识史的著作尚付阙如。

## 五、思路、方法与研究框架

由于区域地理认识的综合性和跨学科性内容、特点所决定的重量和维度,本书采用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地缘政治学、医学、文学等多学科论证方法,主要从历史自然地理学与历史人文地理学两个角度就唐宋时期中国西部地理认知问题加以综合、系统、深入的探讨,主要利用唐宋时期的正史、舆地、诗文等资料文献,结合一定的区域实地考察,从历史学、自然地理学史、区域文化地理学等角度对这一时期有关西北与西南地区地理的地理考察活动兴盛及原因、地理认识的成就、作用、特点、规律、局限分别加以研究;自然地理部分主要整理唐宋时期对西部气候、地貌、水系、山系、植物、动物、矿藏、自然灾害的记述及地理思想史价值、认识水平与局限、错误等;人文地理方面重点探讨唐宋时期对西部地缘政治、民族地理、西部地缘政治、国防地理思想及其演进过程、特征等,最后还采用当代西方人文主义地理的理论与方法对唐宋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西部感觉、意象地理加以探讨,并试图揭示其区域文化地理学意义。在研究方法上,主要运用历史文献学方法与历史逻辑分析法,从地理学、地理思想史角度进行探讨。由于研究内容兼跨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两大学科的复杂性,而且所涉及内容往往需要分析历史背景、历史事件、人物生平思想等,本书并非要写成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断代西部自然地理学史,除了自然地理的认识外,还讨论唐宋西部民族地理观念、政治地理(地缘政治)观念及西部感觉地理等,属于一种大区域广义地理认识的综合研究。由

于目前国内外对中国大区域地理学史的研究基本上还是一个学术空白,难以有类似的著作作为参考借鉴,所以带有很大程度的探索性。

唐宋固然处于社会变革期,但地理学的发展在理论、方法方面却有很大程度上的相承性。同时,尽管学界不断有人倡议呼吁唐宋史跨代打通的研究,但或许因为对历史分期的不同理解和公认的唐宋文献卷帙浩繁,每有浩如烟海之称,因此真正从事唐宋跨代研究者并不多,可资借鉴的成果也很少。作者认为,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与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研究一样,唯有尽可能占有基本资料,方能探求事物真相、得出逼近真理的认识。本书所搜集、研究的史料,除了唐宋正史地理志外,主要查阅大量唐宋人文集、笔记、地志、类书,包括诗文等,力图最大程度上寻求唐宋人在西部地理认知方面的记载,将论证建立在尽可能扎实而科学的基础之上。唐宋人文集和其他私人著述中的记载内容虽然极为繁杂,也有大量看似平庸无聊的琐碎文字,却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当时人曾有的地理观念,包括对西部地理的珍贵记录与见解,特别是原汁原味的文集资料,至今仍然有许多历史地理学者所需的“含金层”,尚待挖掘。本书写作前,重点对唐宋人文集作了研究,几乎将保存在《四库全书》中所有的唐宋文集梳理一遍,搜集到大量相关史料。本文引文多达1200多条(次),除了极少数资料系转引外,绝大部分资料皆自历史文献中查阅检出,其中有不少是别人很少引用甚至从未发现、引用的史料,因而也获得了不少新发现。在资料搜集方面虽不能说已经“竭泽而渔”,但力求尽可能地搜集到相关史料、特别是能真实反映唐宋时期西部地理认识方面的原始资料,以避免内容的空疏和证据不足。

# 第一章 论唐宋时期西部地理学的 兴盛及原因

唐宋时期中国地理学进入全面繁荣时期,其显著特点之一乃是西部地理之学的兴盛,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学术文化现象。不仅唐宋时期政要文人大多留意西部地区地理风情的观察记录,全国性地理总志大多详于西部政区沿革、山川河流、形胜古迹的记载,而且还出现了不少记载西部地理风情的专书,这使得对西部自然与人文地理知识的考察与认识进入一个新阶段,从而也奠定了西部地理之学的基础。

## 第一节 唐以前中国西部地理探索与认识概述

### 一、商周秦汉时期朦胧的西部地理观念

西部是一个相对的地理概念。它是以前一定时期人们地理视野与观念中的地理“中心”来对王朝或国家偏西地区的地理总称。尽管目前考古学界对夏代都城的地望仍然在继续探索之中,但华夏国家的第一个政治中心——都城最早起源于黄河流域的涿、伊、洛平原地区大体上已无歧义。在夏商周时期的西部地理观念中,“西部”(当时习称“西土”)地域概念十分狭小,仅仅指后来晋陕

之间南流黄河以西的有限地区,大体是秦、陇一带,蜀地虽然也属西部,但因地理环境险绝封闭,所谓“西土”一般是不包括蜀地的。西周定鼎岐山之阳的周原,秦崛起于渭水上游的“西陲”,不能不引发华夏民族对西北地区的关注。同时也形成了“天佑西北”、“天道多在西北”的神秘地缘政治观念。

甲骨文卜辞中,西部只有周、羌、鬼方(在今天陕甘交界处)等几个方国。童书业《传说中之古帝疆域》主张研究中国疆域应该从夏开始,认为夏人发源地在西北方基本无疑<sup>①</sup>,柳诒徵考证《周书》中的大夏大约在山西省北部或绥远省,《汉书·地理志》陇西郡又有大夏县,匈奴本为夏之后裔,已经见《史记》、《穆天子传》;《吕氏春秋》卷五《古乐》说:“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伶伦,黄帝臣,大夏,西方之山”<sup>②</sup>。《穆天子传》卷四云:“阳纒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阳纒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春山珠泽昆仑之丘,七百里。自春山以西至于赤乌氏春山,三百里。东北还至于群玉之山”。童书业由此得出结论,“夏之疆域,东似不能过郑州,西似不能过华山,南似不能过伊水流域,北不能过今天山西长治县”<sup>③</sup>。应该承认,童书业对夏商西北地理范围的考证持之有据,有一定的说服力。随后,周之开国岐雍,应该大大拓大西部地理视野。但周人并没有认为宗周岐雍之地为天下之中,常常将

① 《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第一章《传说中之古帝疆域》,童教英整理,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②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第一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③ 《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第一章《传说中之古帝疆域》,童教英整理,中华书局2004年版。

其地称为“西土”，为群神汇聚之地。而且周至秦汉政治地理思想中，一直有“天佑西北”的神秘观念。《尚书·大诰》云：“予不敢闭于天降威，用宁王遗我大龟宝，绍天明。即命曰：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周书·康诰》也说：“夏越我一二邦以修，传用此明德慎罚之道，始为政于我区域诸夏，故于我一二邦，皆以修治。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传我，西土岐周惟是”。《左传》也载有“天道多在西北”的说法<sup>①</sup>。

先秦对西部自然地理的认识自然十分模糊朦胧，到了战国，反映当时理想大一统国家政区区划的《尚书·禹贡》篇中，属于西部地区的也仅仅只有雍、梁二州。雍州相当于现代之陕西、甘肃大部，而梁州，“华阳黑水为梁州”，大致相当于今陕西省南部、四川、重庆一带。西南不过大渡河以南、西北不出河西走廊以西地区，同时陇山也是戎狄与华夏的分界线。由于西北并非先秦主流史学的记述中心，加之秦火焚书，即使秦人史传也大多早已荡然无存，造成今天探讨先秦时期西部地理认识与观念的极大困难。以至于我们今天只能凭借十分有限的先秦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来探索当时人的地理视阈范围及其地理认识水平。

战国后期，虽然争霸战争也屡屡涉及西部，如秦对巴、蜀的兼并及楚庄王时楚将庄跻入滇等事件都可能使内地对西部地区地理知识有所增加，但对西部边远地区而言，内地的了解仍然相当有限。屈原乃博学之士，但对西北之地的地理知识却十分有限，所具有的只是充满奇异的想象之辞：一方面将西北地区说得瑰丽奇幻：“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凤皇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

---

<sup>①</sup> 《左传·襄公九年》：“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